

杨守敬与森立之的《清客笔话》

王 铁 策

杨守敬（1839～1915）是我国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兼考据学者。1880年作为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访日，1884年归国。在日本的四年中收购了大量中土亡佚的古籍及珍篇的日本汉籍（大部是经史及医书），并因编著刻印了《日本访书志》、《留真谱》、《古逸丛书》等不朽名著，从而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名垂青古的杰出人物。

笔者久慕杨守敬访书之举，杨氏的著述，早已熟知，观海堂、飞青阁等藏书也已成旧闻。然而，若对杨氏访书之经纬、成就诸要因做一结论，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壬申秋月，笔者负笈东渡，求学于小曾户洋、真柳诚二师门下。二师都是日本资深的医史文献学者，小曾户师素享“平成的森立之”美誉，对日本幕府末期考据学派着墨很多，于杨氏访书也如数家珍。笔者遂得以知晓森、杨二人的特殊关系，及其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访书笔录——《清客笔话》（以下简称《笔话》）。

一、杨守敬访书缘起与《笔话》的问世

翻开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献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以汉籍文献东传为主的历史画面。难怪宋代欧阳修在他的“日本刀歌”中吟道：“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①这多半是感于这种文化现象的缘故吧。然而有谁能料到，时隔八个世纪，他的诗

句竟唤起了杨守敬等人的访书热情。杨氏在“访书志缘起”中说：“庚辰东来日本，念欧阳公百篇尚存之语，颇有收罗放佚之志，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乃日游市上，凡板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其中虽无秦火不焚之籍，实有裔然未献之书。”^②这即是杨氏访书的动机。诚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杨氏访书虽未能从整体上剖析汉籍东传的文化现象，但是他访到的庞大的观海堂藏书，写下的访书志、笔录、回忆等，却为我们研究这种文化现象，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如杨氏在“访书志缘起”中指出：“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同^②）吴天任在所撰的杨氏年谱中进一步解释说：“是时日本正值明治变法，百度更新，国人于汉学旧籍，弃如敝屣。先生日游市中，颇多未见珍本，因出所携碑版古钱，以有易无。”^③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明治维新的冲击，提倡西学新学，废弃汉学旧学的风潮才使中国文化大规模东传的历史暂时休止。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杨氏访书二十年后，出现了又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即江南陆心源全部15万卷藏书悉被日本人购去。而导演这场“悲剧”的，恰恰是帮助杨氏访书的日本友人岛田重礼之子岛田翰。

杨守敬最初访书，只是随机搜购，后来由于结识了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町田久成、岩谷修等日本朋友，尤其是得到森立之《经籍访古志》的启示，并通过与森氏的借抄、购入、交换等方式，得到了若干江户医学馆，以及幕末考据学者如狩谷斋、市野迷庵、伊泽兰轩、小岛宝素、涩江抽斋等人的旧藏。杨守敬与森氏往来造访的各种信函、便条、借据，以及对书籍版本鉴别，各人的学术爱好，对中日学界、医家的评价等等，二人均以笔谈方式进行。本世纪40年代末，当经过剪贴保留下来的笔录原本被野田氏抄写后，这一鲜为人知的访书实录才公之于世^④。

二、《笔话》的结构

《笔话》共8卷，从辛巳（1881）年一月二十一日至壬午（1882）年八月止的往来访谈、信函、便条等（谈话止于壬午年五月）。

《笔话》是将森、杨二人在森宅的谈话笔录等粘贴而成的，所用的纸质也有信笺或稿纸的不同，而贴附的衬纸，则有森氏就职的大藏省印刷局用稿纸，以及利用森氏经营的皇汉医学研究所发行的月刊《温知医谈》的背面等。因而可确知是森氏所粘贴成册的。《笔话》每卷1册，卷1~5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访书内容。即第1卷是辛巳一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八日、四月二十一日四次笔谈，共26枚；第2卷是辛巳五月十七日、六月二十一日，共26枚；第3卷是辛巳七月五日，共8枚；第4卷辛巳八月二日，共10枚；第5卷壬午三月，共10枚。第6卷是杨氏的借书条和便笺，排列不完全按时间顺序，既有壬午八月，又有辛巳七月，还有未明的四月、六月、十月、十二月等借条，共14枚。第7卷是围绕《太平御览》购书的商谈，有辛巳十月某日、十一月四日、壬午五月三次共7枚。第8卷是在辛巳十月、十一月四日，有关《三国志》沽却与否的商谈，共7枚。笔谈的记录形式是用毛笔的草书，各条上由森氏后附“、”与“△”，分别代表“主”、“客”之意。

杨氏居日本4年之久，森氏还多次去杨府造访，但由于是森氏整理，所以在杨府的谈话则告缺如。另外，对森氏不利的谈话俱未收入。如杨氏观海堂藏书中，颇多幕末考据学者的藏书，前述的狩谷、市野、伊泽、小島，涩江诸氏的旧藏，后来均入于森氏与山田业广之手。而山田氏在杨氏来日的第二年即已去世。“因此若说杨氏访得的诸考证学者的旧藏，全仰森氏并非过言。”^⑤此外这其中不乏从官库借得，转卖给杨氏，似可推想，有的谈话

森氏是讳而不留的。更何况森氏晚年因对抗官府取缔汉医的政策，久已“废医业为学徒”（《笔话》卷2，以下同），生活每况日下，壬午下半年之后，“生活贫极矣”，^⑥尽管嗜书如命，也不得不忍痛割爱，“纸币多少授与是祈”（同上）。这种心态，自然不愿向众人披露，似可说明壬午六月以后的谈话缺如之疑点。

三、《笔话》的内容

尽管《笔话》仅仅是杨守敬留居日本时的访书片段记述，但杨氏与森立之对古籍版本的鉴赏，对汉学研究的志趣，以及对珍本书籍刻印流传的热望，都通过这无声的“声像”，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对《笔话》内容的剖析，不啻重温了中日两国学者在19世纪末叶的学术交往史，更将使汉籍流布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推进一步。

（一）书版鉴赏

杨氏访书由随机搜购到慧眼识珠，得力于结识了森立之这位幕末的最后一位著名考据学者，和他的《经籍访古志》一书。

“该书的最大特征，在于所藏、版本、书式，考证、藏书印等详细的书志情报。据此可以鉴定版本，判断善本性，进一步判明现存本在幕府末期的所藏情况。”^⑦由此使杨氏一改初衷，而常造访森宅。

杨氏求见书目，见于《笔话》者，去其重复尚有《宋本玉篇》、《广韵》、《太平御览》、《左传》、《说文解诂》、《水经注》、《三国志》、《国语》、《古京遗文》、《姓解》、《史略》、《玉篇》残本、《玉烛宝典》、《本草经考注》、《太素经》、《大观本草》、《诸子考异》，《魏武注孙子》、（古抄本）、《隶释》、《秘府略》，《玉台新咏》、《鹿国策》、《拾遗记》、《汗简》、《广雅疏证》、《集韵》、《孟

子》（以上卷1）、古宋版《玉篇》、《广韵》、《易正义》、《孟子赵注》、《古文孝经》、《灵枢》（卷2）、《淮南子》、《书录解题》（卷3）、《楷声图》、《荀子补注》、《皇清经解》、宋版《荀子》、《孝经直解》（卷4）、《弘决外典抄》、天平抄《孙子》、《篋中集》、《中兴间气集》（卷6）等。

森立之对书版的鉴赏独具慧眼，如《笔话》卷4杨氏说：

“《玉烛宝典》误字甚多”，森氏云：我辈以有误字本为贵。若其误字一目而可知，知而后说立，说立而后校注成。别作无一误之定本则可，不得以古本为误本也。是我家之读法也。”卷5又云：“《玉篇》、《广韵》共以原本为贵，但原宋本误字甚多，故以可贵，其误字中可以取考者，往往而有之。清翻刻本一一正误字，吾今以清本为据，不复以宋板为贵。其误字，是可以从、是不可从者，其见皆在于我，不可以善本为善也，是事所立一见也。”廖廖数语，道出了森立之等日本考证学者的读书法，亦颇有见地。联系森氏在卷4对段玉裁等人的学术评论，如“尊崇段说固然，如礼说别有发明，所人不能言者往往而有。但天下言语皆在此书（即《段注说文》——笔者注）中，然至于名物则不及郝氏（郝懿行——笔者注），至通音通字则不及王氏（王念孙——笔者注）者不复少”等，也显现出深厚的小学功底。均说明其学术渊源有自。杨氏在森立之的启发引导下，深有所悟，“仆以前专心金石文字，于经史未用功，近日始颇有察学之……公髦而好学，我辈愧耳。仆若得留此，当常往来求教，公以为孺子可教否？”（卷4）并云：“然欲作《日本访书志》，凡公之古本皆欲借而作跋”。（同上）据杨氏在《日本访书志》北齐人书《左传》的跋文中说“东瀛一行，著录数万卷”，可知杨氏收获之富。

（二）购书与易书

判明版本是访书的前提，而收藏利用则是访书的真正目的。

无论是森氏的割爱出让珍本，还是杨氏的“好书成癖，颇以公诸世为藏书”（卷2），功利的后面，都蕴含着中日学者对书籍这一文化载体的价值认识。

杨氏访书大致有三途，即主要是购入，其次是交换或者借抄。当然也有少量朋友所赠。杨氏在《经籍访古志》的引导下，购书的原则以古抄、珍善本、孤本为主。如在《日本访书志》卷一，宋刊《尚书注疏》条下，杨氏说：“亲至日本，竭力搜访，……余以为日本古籍有所见，志在必得。况此宋槧经史，为海内孤本，交臂失之，留此遗憾。”购书的种类，如森氏所说“只经史之书及医书等，可沾却者，或有之耳”。（卷1）杨氏在“访书志缘起”中也说过，“日本医员多博学，藏书亦医员为多。喜多村氏、多纪氏、涩江氏、小岛氏、森氏皆医员也，故医籍尤收罗靡遗”^⑧。除却杨氏所购《聿修堂医学丛书》等的书板，“根据故宫博物院的目录，现可推定杨守敬观海堂本，仅医药书籍就有大约5741卷，2874册，536种”^⑨。尤其小岛氏素以医籍收藏丰富著称，他的《宝素堂藏医籍目录》与故宫博物院杨守敬观海堂本目录的医药部分大多重出，足以说明“小岛宝素的旧藏书等几乎全部流入杨守敬手中”。^⑩

杨、森二人的购书笔谈，更是回味无穷。如森氏云：“君以吾所爱书恳求，其心志卓然，窃迎其德。然吾亦同好事，故不许出门，各不得已之，至遂如此尔。”（卷5）杨答：“公不让我，他日我不能豪夺，我将巧偷，公其善防之。”（同上）森氏爱抄本，一部《太平御览》抄本，“虽千金不卖”，“金银以纸代之亦可，珍书一失，不复反哉”。杨氏则一再表示“公好古之情，与仆同然，仆得之欲再校之也，非为谋利也”。森氏仍“复断然如石”（卷7）。因此从辛巳十月购求，至翌年五月以百圆割让，究竟是杨氏的执着感动了上帝，还是其他原因，森氏在《壬午睡余杂录》中做了回答。森氏在壬午六月二十九日给杨的信中写

道：“《御览》必竟难割爱，然建筑多费无所补，回遂至沽却也。昨今贫极矣，纸币多少授与是祈，至明日则尤妙。”（同⑥）

杨氏除了以纸币购书外，还用随身携带的金石、汉印拓本、古钱等易书，有时还以新刻易旧板书，或以初刊易古抄。此外，以书易书有时还作为购书的附加条件。如森氏收藏的配补本《三国志》“宋元明三版共有，……只此一部，故不沽却，他有一部则可鬻去”，“直沽却则廿圆也，若得一本则十圆而足矣。无一本则不为用”。并言“此《三国志》天下无二之本，与清版交易则不可”（卷1）。清版“六十五卷本者，略删却颇多，不足据也，虽补全断然辞之”。（卷8）

借抄，是在购、易都难实现时的一种访书形式。如森氏藏“《易正义》三部，一为棧斋旧藏，一为天隐禅师书，一为增岛行阴所藏本，非全本”。杨氏商以“公所有抄本可以相让否？不可让可以借否？”森氏则答以“宜借不宜让”（卷2）。然而抄书并非容易之举。如杨氏“从枫山官库借出古抄卷子本《左传》二十卷，吾意欲属写生钞之，但此书浩繁，非十人写之不能成”。

（卷6）究其缘由，“借出限十日交还”^⑪。《笔话》卷6均是借书条，如“借《皇疏》二册，限三四日返却”等亦如是。他如“再先生所注《素问》，《本草》……则祈属写生钞之”。（卷6）“又有《史略》、《姓解》等皆属人影抄之”。（卷2）以及《隶释》之抄补（卷2），《秘府略》之不割爱而属写之（卷1），《荀子》之借抄（卷4）等等。可以看出珍本借抄的目的：一为补足残缺，一为抄刻流传，一为收藏。

有关赠书的谈话，《笔话》仅见一次，即卷6杨氏谈到“吾书已入箱，公许赠《汉书》及《北齐书》，未知今晚可赐否？”笔者管见，森氏赠给杨守敬的书籍，决非仅此。如森氏在编纂《经籍访古志》过程中，非止医书，凡目睹之古本，均连印记都影写下来，汇为巨册数本，赠予杨氏，杨氏补以宋元版等书影而

成20册的《留真谱》，^⑫就是一例。该书在版本鉴定上的价值，是中外学界有口皆碑的，该书凝聚了赠书者森立之的智慧和心血。

（三）刻书

杨守敬一生著述甚多，编著、刊行或他人整理而成者总计60余种。^⑬杨氏在日本主持刻印的《古逸丛书》，在清刻丛书中“更是个中翘楚”^⑭。《古逸丛书》影刻了存于日本的各种影钞古卷子本、影宋元刊本、钞本共26种，见于《笔话》中就有8种。即绍熙本《谷梁传》、覆旧钞卷子本唐开元御注《孝经》、影宋台州本《荀子》、旧钞卷子本《玉篇》、覆宋本《重修广韵》、影旧钞卷子本《玉烛宝典》、影北宋本《姓解》、影宋本《史略》。《笔话》在探寻杨守敬以什么视点选择刻书方面的记录，更能揭示清末中日学界的文化主视野。如杨氏欲刻印《谷梁传》，并向森氏表白：“盖刻之非徒弟附以不朽，即向山（向山黄村——笔者注）亦不朽也。……且弟非为利也，如《谷梁传》刻之，明知无还本之日，盖好之少也。”（卷2）这是他重义轻利的品质表露。又如对《玉烛宝典》，杨云：“此即掖斋所倩书手抄之者乎？我将刻之。”（卷2）对于森氏所藏的《易正义》，杨氏以为“此书再增补一次，我必为公刻之，公可增补否？如此之类”。而森氏却说“增补为之容易，所云玉石混合者。虽残缺刻之可以，不须增而全之也”。（卷2）二人均专注于名人精抄，此其同，另一面则杨氏求全而不论玉石混杂，森氏宁缺，虽断简弥足可珍。联系《笔话》中森氏多次谈到“不以善（足）本为善”，“以有误字本为贵”，似可悟出日本考证学者在文献研究中，更尊重古籍原典，而我国学者则追求后世的校补训释。但毕竟杨守敬颇受教益于森氏，遂于《古逸丛书》中影刻了我国最缺少的古钞、宋刻等。此外，杨氏所购的日本丹波家的《事修堂医学丛书》书板，在国内一再刊行，继有陈存仁等踵其后，相继刊

行《皇汉医学丛书》等，国人开始注目日本汉籍医书的学术价值。《聿修堂医学丛书》的传入，遂成为近代汉方医学文献大规模回传“母国”之嚆矢。

（四）日本汉方医界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命运，以汉学为主体的文化模式，在废除旧来陋习，广求新知的口号，和废弃汉学旧学，提倡新学洋学的一系列措施面前，迅即瓦解，使日本社会急激地向着西化迈进。因而，一切传统的东西均被视为因循守旧的沉渣被扫地出门，汉方医也毫无例外，“不洋则非医，汉医老生则一生为限，其子则必不学洋不得为医家”。（卷2）盛怒之下，森氏遂废弃九世医业，而为大藏省印刷局的学徒。即使医术在当时居第一位的浅田宗伯，在“汲汲世事”面前也“其务不堪”（卷2）。不过，浅田氏并未低头，继山田业广之后成了温知社第二任社长，扛起反对新政府汉医废止政策的大旗，为振兴汉医而奔走呼号。森氏对幕府末期医家兼书志学者的丹波父子的学术，也给予了公允的评价。并慨叹当时的日本汉方医界不再会有丹波父子这样有高深学识的学者。因为连《医籍考》这样的旷世杰作，在当时“见之读之而解其意者，日本国中无多者”。（卷2）有鉴于此，民间这种复兴运动才此起彼伏，温知会等团体，倡温故知新，还授业教徒。森氏被聘为讲师，“日日以讲医书为业，只疗医者而不疗病人。不肯犯国法故如此，实可叹也。”（卷2）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维新政府的不满，也表现出有识之士为复兴汉医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四、结语

杨守敬与森立之彼此诉诸衷肠，小及家世学术，大至社会的东西洋文化观念等，也包括购书引起的误会与争执，均通过《笔话》反映出来。《笔话》虽不是杨、森二人交往的全部记录，但

从每次谈话都有一个至几个主要的命题，并且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怒好恶来看，《笔话》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文化的巨变下知识阶层、医生的各种心态。然而更主要的是它忠实地反映了日本汉学研究及汉籍特藏的现状，作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特别是汉籍交流史的重要史料，必将载入史册。

《笔话》的中心议题是访书，杨氏访书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得力于森立之的指导、中介和《经籍访古志》的启发。由于《访古志》是幕末考证学者多纪元坚、涩江抽斋、森立之、堀川舟庵、小島尚质、海保元备共同完成的，^⑮森氏则是其中最后健在也是最有成就者，杨守敬才通过森立之得到了若干上述学者和江户医学馆的旧藏。（同⑤）而江户医学馆的藏书当时刚刚归入成立不久的太政官文库，杨氏访书时，该文库管理尚松散，待其实行严格管理时，已是杨氏归途的1884年了。另外，森氏也在杨守敬归国的次年病逝，所以可以说杨守敬非常幸运，这是在其前其后都不会再有第二次的访书机会。（同上）这也足以解释了杨氏之前的黄遵宪，杨氏之后的傅增湘、董康、孙楷第等人都没有如此巨大访书硕果的缘故。

杨守敬在“访书志缘起”中指出：“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板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之。于是旧本日稀。”（同②）如果说杨守敬访书的轩然大波，刺激了日本学界，使其重新认识了汉学汉籍的价值，遂有日本岩崎氏购走江南陆氏皕宋楼全部15万卷藏书之举的话，那么同样可以说，通过杨氏访书，中国学界也受到了极大震动，开始认识了自己汉籍研究以及汉籍藏量方面的弱点，遂有李盛铎、董康、傅增湘、孙楷第诸氏都把访书的目标指向东瀛。

顺便提及，本文所依据的，是《笔话》的复印本，其原本藏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斯道文库，笔者因错过该文库每年一度的晒书的机会，始终未能一睹真迹，仅以此文向国内同道介绍。

注:

①《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卷四，张元济等《四部丛刊》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二次印本。

②见光绪丁酉（1897）嘉平邻苏园开雕本《日本访书志》。

③见吴天任撰《杨惺吾先生年谱》光绪八年条，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排印本。

④原田种成，清客笔话——杨守敬と森立之との笔谈——，《图书学论集》，东京·三省堂，1973年。

⑤小曾戸洋等，汉方文献の善本を所蔵する图书馆とその利用法，その2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蔵杨守敬观海堂本，《药学图书馆》，27（1）27，1982。

⑥川瀬一马，森立之·约之父子，《日本书志学之研究》，810页，东京·讲谈社，1971。

⑦王铁策，近现代にわける中朝古籍书志目录の检讨，《汉方の临床》41（8），1084，1994。

⑧同前掲文献②。

⑨同前掲文献⑤，28页。

⑩同上，29页。

⑪同前掲文献②，卷一，《春秋左传解》条。

⑫同前掲文献⑦，1086页。

⑬赵飞鹏，《观海堂藏书研究》，57～63页。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

⑭同上，50页。

⑮同前掲文献④，1083页。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中医学院医史研究室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